



城市文學節 2013 分組交流會（文化與藝術評論組）

日期：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2: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5樓多用途活動D室（R5004室，
13號升降機）

嘉賓：林沛理先生、許知遠先生、廖偉棠先生

主持：馬家輝博士

記錄：朱樂然同學、江亭君同學、張淑誼同學

主持：各位同學、朋友、老師、前輩、大家好！每一年這個時候都是城市大學最熱鬧的時候，我們這組也是最熱鬧的一組。歡迎各位文藝少女、文藝青年等等朋友！每一年這組別較熱鬧的原因皆和我們的講者脫不了關係，我們今年有三位嘉賓。關於文化文學評論，相信三位嘉賓也有很深的見解，還有很獨特的想法和大家分享。至於他們每人的講題是甚麼，我想他們心中也有想法。我們先請廖偉棠，他是一位詩人、作家、攝影家、父親等等。我們來歡迎廖偉棠。

廖偉棠：現在華文評論的整個生態對寫評論的人來說，香港給人的感覺是慢慢的萎縮和出現一種很尷尬的境地。那尷尬的境地是一來你可能需要借助內地的政體去發言，二來在香港媒體的萎縮，直接連累到我們想在香港多說兩句話也沒有地方說，但是在大陸的發言也有一種尷尬在其中，你跟他們期待的可能是不一樣，大陸的讀者心目中對一個香港的評論人或是文化人有一種支持，比如說有些人會支持你是民國犯，你們好像董橋就很適合他們的支持。如果是在藝術上很尖銳的，說一些很偏頗的，在藝術上追求一種很前衛的藝術，大陸的讀者就會覺得香港應該是保存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的保衛者，但事實跟他們想像的有不同，因此有很多錯位的出現。

另外，對新聞的操守的理解不一樣，好像最近的朗天事件，我也被捲進去，香港的影片藍天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南方娛樂採訪，約他們寫關於電影低俗喜劇，現在低俗喜劇成了漩渦的中心，朗天寫了一篇文章，但被編輯改了題目，更斷章取義，把一些句子刪除了，然後朗天就很氣憤，經過跟編輯的交涉後，那編輯說會用網絡版給他補充上去，但朗天認為還是不能接受的。後來那編輯就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講述這事件，而這篇文章給一個香港人轉貼在微博上，有人加了我的名要我說兩句，那我就表達了一些看法，但是就跟那個編輯和報紙的另一個作者，也是大陸比較著名的評論人就直接吵起來。在他們立場，編輯就能把作者的文章改動。雖然我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至少我還未成為香港人之前我也認為我的文章不能被更改。至少你約我寫稿要改動我的文章一個文字都

要取得我的同意，但那編輯也算誠懇地跟我在網上交流，沒有那種跟我吵架的表現。他一直只在辯論一點就是他學新聞的時候，他的老師就告訴他教科書是說一個編輯就要發揮自己的創意把題目寫得吸引點，編輯能編改評論者寫的文章等等。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好像低俗喜劇帶來的中港差異混在一起的時候就令人有一種百口莫辯的感覺。香港作者朗天就覺得啞巴說謊言的感覺，他在香港發表文章辯護的時候，大陸的評論者又取了公知，用一句大陸很流行的話去形容朗天「賤人就是矯情」，這麼刻薄的一句話來指責一個只是要維護自己一個平常權利的人。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大陸眼中就是「矯情」，覺得你是在爭取多餘的東西。他們覺得就這個問題採訪你已給你很大的面子，就是有這麼一種媒體跟作者的關係在其中。這就是造成很多香港文化人存在對北上猶豫不決的顧慮，的確是兩個不同言論的去想事情，但評論就是需要作出表態、拿出立場的一種文體。如果你沒有立場的話，你不表態的話，大家就會有一種不屑於看你的文章不需要看你評論，但當你表態的時候，從一盆水到另一盆水會染成另一種顏色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不知所措，這也是一些好的香港文化人為何不寫，他們都以朗天的例子回答不是不想寫而是寫了以後很可能原意就得不到傳達，這是目前很難解決的地方。大陸對香港的無睹直接影響香港文學和香港評論的傳播，而且大陸有一個我觀察到的情況，無論你是香港、台灣或海外好像都帶着一個原罪。首先你是香港人，憑甚麼對中國說三道四，這算是五毛言論，有一種是抱怨式的說法，如果是一個香港評論家去評論香港的時候，又有另一些人會說飽漢不知、餓漢不知這種說法。他們覺得香港人已經很好很民主，身在福中不知福，去罵香港的不民主、勞動者沒有好的待遇等等。這種種錯位都是一種原因大陸的長期牽入了扭曲，好像大陸的民主人士、大陸右派，他們發表言論的時候，會發現他們會用反對他的人的邏輯，而他們的語言就很文革體，可能他是一個文革受害人，在長期不健康的共生狀態下就很難抽離出去，那也很難理解一個不是生存在這種生態下的人。像梁文道的文章，用常識的方式去說話，我發現有時候我認為是常

識的東西，但很多讀者眼中就是危言聳聽，有的覺得是兩個世界，你一個香港人怎麼會明白到我們的苦衷。這個苦衷是一個前規則，在大陸就是要這樣說話，就算反對也不應有一種反對的透露，但你採取了不一樣的透露，那就代表你不能與我一齊共命運的，那你就失去了發言權。這就是我在這兩年最大的體會，特別是在微博上那種直接的交流，我算是比較熟悉大陸的前規則的東西，但都遭遇了這些尷尬，香港的評論人會遭遇到的誤讀。

主持：我先說一下我的回應吧。因為廖偉棠的經驗和觀察都很深刻，我聽到的時候也有很多感受，所以忍不住就回應一下。我一邊聽一邊也心有同感，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我都寫很多的專欄，其中也有散文和評論。有些是根本不能發表的，寫的時候就知道不能發表，只能在香港發表。有時候我寫了給大陸的媒體，可是我完全可以預測他會把我哪些地方刪掉。或是同一篇文章，可能在北京可以發表，在廣州不能發表。所以我的經驗告訴我在大陸寫評論，不是一個不舒服的地方，但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遊戲規則。我個人要對它理解，與他互動，看哪些空間我可以去做。比方就，用廖偉棠提到朗天的例子，這事情坦白說在大陸是很常見的。我們在香港寫作，還包括台灣在內，真的沒有甚麼情況沒碰過的，包括被改標題、扭曲黑變白。不管他是有意無意，都有太多的遭遇。那我覺得朗天在大陸出現這種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一定很不舒服，很不自在。可是中國很好玩，大國夠大就很不一樣了，那表示說你玩的遊戲可以很豐富、很多層次。大陸一定有其他媒體願意登，甚至在自己的微博、博客等等地方，總能找到發言的管道。當然影響力、接觸面不一定那麼廣。可是很難說，看娛樂版讀者的水平會有多高呢？他看完會有甚麼心態去看整件事呢？可能只當是一則笑話。簡單來就，我們要預估大陸這個新的市場，會遭受甚麼反應。要把部份算清來，但這部份卻是更難去計算，因為一定會有另一群人，那群人不一定是小的數字，你們能對他們產生影響力，能持續一直走下去。這部份可以再說、再開拓。我想這部份偉棠兄一定能體會到，

那種滿足感是你從前在香港所不能體會到的。

廖偉棠：在香港這個東西是兩面的。首先，你做任何事時人家對你都是麻木的，沒有人會罵你、也沒有人會捧你，總之是沒有任何反應。這和在香港上課是一樣的。我在香港跟大學生、中學生上寫作課時，大家都是不作聲的，也不會興奮或反感你說甚麼。你完全覺得自己在背書一樣，那是十分沒勁的。而在大陸，有人可能會挑戰你，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迎合你，起碼都比這種麻木好。

主持：偉棠說到了寫評論的麻木，但我想這是不一定的。最近低俗喜劇的事件，不僅不麻木，而且很熱鬧。我們都看到網絡上下都有很多討論等等，那接下來就到林沛理先生分享。當然我沒有要沛理說這個話題，但因為這是一個公共議題，林先生的看法也清楚，發表在《亞洲週刊》和藝術發展局的公告中。我想除了這個看法以外，對於事件有沒有甚麼後顧、想法、領悟、體會。這部份我覺得朋友們，包括我在內，難免會期待、好奇。我們歡迎林沛理！

林沛理：大家好！當然我不會介意爭議，也不怕攻擊。假如你怕的話，就不應該寫評論。早陣子有齣電影獲奧斯卡最佳電影獎項——*Argo*，戲中的內容我也不太記得了，但有一句對白便是所有寫評論人的座右銘——「如果我們需要喝采聲和掌聲，便應該加入馬戲班」。我覺得寫評論也是如此，如果你認為掌聲很重要，想聽到別人的讚賞，有自我良好感覺的話，你便應該加入馬戲班。那馬戲班便是寫作其他的範疇，你不應該寫評論，因為寫評論是一件很不討好的事。很多時候越有意思的評論、越令人反省的評論，就越不是政治正確的評論、越和主流社會價值相反的評論。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基本的認知，間中也會提醒我，很多人也持着不同的看法，包括以寫評論為職業的人。

其實對我而言最驚奇的事，不是香港評論水平的高低，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評論是甚麼，包括那些從評論中得到最大益處的人、

從事寫評論行業的人和閱讀評論的人。這是比評論水平高低更嚴峻的評論問題，而香港評論的危機便是來自這種認知。比如說，當我們批評一件作品的時候，就是不是在傷害那個作品呢？評論扮演的角色和其功能是甚麼呢？如果我們要支持香港電影，便不應寫一篇批評香港電影的評論？這看似是常識，現在卻已變成反常識，變成如果你支持香港電影，便不應批評它。這是一個錯到無以復加的想法，完全違反常識。批評香港電影，其實就是討論香港電影。任何藝術品，包括電影的生命力在於，是甚麼令作品與觀眾、讀者有關係，而評論是藝術作品的保鮮紙。這和藝術的本質有很大的關係，藝術本身是不會說話的，是一件很曖昧的事，它並不會告訴你它在事件上的立場。藝術不是一篇論文，所以評論人有一個很大幫助，便是嘗試去解說作品。因此評論人在這方面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令創作更可解，至少他能令藝術創作與觀眾、讀者，發生一個關係。當然，評論所提供的不是一個一定正確，或最能解釋作品的觀點。

但是，到底甚麼是真相呢？直到現在，仍有一些人認為藝術評論是關於真相，類似科學的真相，是 objectively true 的事。這是錯誤的看法。我們怎可要求藝術評論提供真相呢？藝術評論是關於看法和觀點。無論我們在批評或讚揚作品，藝術評論也是在歌頌作品。它能告訴你那作品是可以詮釋的，是可以引起討論的。很多時候當你很強烈地批評一個作品時，是在用一個轉彎抹角的方式去讚揚那作品，因為那作品對你產生了效果。我常常說對藝術品最大的侮辱並不是批評它，而是無視它。如果整個社會都不評論那作品時，就是對作品造成最大的傷害。其實這是一個很顯淺的道理，但時至今日，很多人仍不明白。當創作人或作品被批評時，他們也接受不了批評。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評論是特別具爭議性，而爭議性正正是作品的生命力，越有爭議性便越有生命力。比如說，最近受惠的便是《低俗喜劇》。早前的例子又如《色戒》，其爭議令電影在華人社會中成為重要的作品。在藝術評論和文學評論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開放式文本。越是開放的文本，能詮釋的空間越大，

其實是越有趣的。直至今日，經過時間的考驗，我們仍覺得那作品是有趣的話，絕大部份也是開放式的文本，比如是莎士比亞的作品、《紅樓夢》、希治角的電影等等。希治角其中一齣電影《迷魂記》，你可以從不同層次去解讀，單純的一個偵探故事，或是人的自私、愛情的本質等等。這是因為電影本身有一個相當大的曖昧性，而評論的不同角度令電影有爭議性。假如你只有一個方法去解讀電影，那電影怎會有趣呢？

另一個誤解就是今次藝評獎的風波，有些人說得獎作品並不是關於電影的，根本不能稱作影評。這是荒謬的，是不是只有一種方法寫影評呢？是不是影評便一定要說電影所運用的語言呢？如果要說電影為何受歡迎，反映到社會的價值，為何不是影評呢？這反映到香港，不論是記者、影評人，或從事創作的人，對評論的觀念很原始。很久以前流行的評論，已經不是集中說那電影本身的語言，或藝術本身所運用的語言——文本式評論。在西方，文本式評論已不再流行超過十年。如果你看紐約客、紐約書評，他們也把電影放在較大的社會範疇，說電影有何社會意義，它反映了甚麼社會價值、為何會受歡迎。電影受歡迎的時候，其實是滿足了怎樣的集體幻想諸如此類。早陣子流行的電影，是關於痛苦的，怎樣虐待囚犯去拿取機密的資料，很多時便會從這個角度去看電影。而說 *Argo* 的，便會說為何電影能得到奧斯卡的青睞，因為電影本身就是歌頌拍電影這個行業。但是這些都不是關於導演的拍攝手法、剪接是不是很緊湊、劇本是不是寫得好、演員是不是演得好。假如我們用這個角度去說電影時，讀者和影評的關係會有多密切呢？但如果說電影反映到社會甚麼的價值時，這關係到每一個生活在香港的人，它會令你更反省自己置身於一個怎樣的社會。因此這種所謂 contextual criticism，不但是一種完全合法寫影評的方式，還是更有效寫影評的方式。如果有記者、影評人、演員、導演質疑這是不是一個寫影評的方式，面對這些驚人的無知時，你又能可以做些甚麼呢？香港最大的問題在於，越來越多人說民主，但很多人都把心力放在爭取一件從來都沒有的事。可是，對於一些一向擁有，但現在越來越消失的

事——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社會，卻似乎沒太多人關注。如果香港變成一個缺乏包容的城市，會不會有好的評論呢？這絕對是會成為疑問的。

我想回應一下廖偉棠說到關於在大陸寫評論遇到的問題，他是很熟悉媒體的運作，說的話也很有參考價值。可是，我認為我們該關注，我們很容易把一些事說作中港兩地的文化差距或文化衝突。其實不然。廖偉棠和馬家輝剛才也有提及到，假如你是一個專業的寫作人，一定會遇到的問題，也不只是發生在大陸的問題。香港媒體的審查、編輯的控制，其實很多方面可能都比大陸嚴重。在大陸寫文章被編輯刪掉，或改標題。香港未必會出現這種情況，而是文章是根本沒有機會刊登。廖偉棠提到編輯認為是順理順章的事，當他根本是接受這種訓練時，絕對不出奇。如果說到在美國的情況，西方現時最佳的文化雜誌——*New Yorker*；它著名的地方在於它有一個很嚴格的編輯控制，控制着整本雜誌，包括用字。甚至當你遞交一篇文章時，它會大致上幫你改寫。我有朋友寫了一篇關於工潮的文章，當中最重要句子被刪掉。我是想說編輯和讀者之間是一個權力和利益的關係，編輯到底有多重視讀者視乎很多因素，也和讀者本身對報紙有多重要有關係，它對讀者有多大號召力、吸引力有關係，也和寫作題材的敏感度、會否得罪人有關係。我很難想像蔡瀾寫的食評會被編輯改動。可是，如果你寫的是敏感題材，那便經常會有被編輯改動的危機。所以寫作人也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置身於一個權力關係中。你可以有多大的寫作自由呢？這很視乎你在權力關係中扮演着怎樣的角。我覺得香港近年來政府出現管治危機，或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公民社會面對很多的問題。你可以說是傳媒的專業崩潰，寫評論也只不過佔整個傳媒崩潰一個微不足道的部份。更加重要的，並不是你所繳交的文章有沒有機會刊登、你可以寫甚麼、登甚麼，而是傳媒如何制定議程，怎樣界定甚麼是新聞、怎樣做新聞、怎樣可以指鹿為馬、怎樣可以黑白不分。這不是一兩份報紙的事，而是香港整個新聞媒體都可以好像隨着一些報紙的指揮起舞做新聞。

在是次事件前，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敵人；但是今次事件後，我才知道自己的朋友是這麼少。這是因為整個香港作為公民社會失效。媒體怎做新聞是一件事，但應該總有一些人，無論是基於正義感、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當你看到黑白是非時，會出來澄清一些概念。可是沒有人這樣做，因為大家都明哲保身。只要有少少常識判斷和獨立思維的人，也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他們不出來澄清有數個原因，第一是不想成為眾矢之的，既是事不關己，便無謂自找麻煩。第二是有些人會覺得那份報紙是民主的盟友。民主是現時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無論我做了甚麼也好，在民主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它給了我很大的忙，故其他事便可視若無睹。在這情況下，我想香港是有很大危機的。當整個香港都容許一些事情發生、把明顯的是非黑白都混淆時，這個社會會變成怎樣呢？還可不可以在一個缺乏包容性、缺乏常識的社會中，滋生民主呢？

文化評論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社會狀態下產生的。我當了城市文學節文化評論組的評判已經好幾年了。這些年來我看參賽作品的質素沒有提高，有一兩篇過往冠軍的作品是較突出的。可是，整體而言，參賽作品的水平不是逐年提高，這和香港評論水平一致的，也可以說是每下越況的。現時香港的評論是深思熟慮的，能夠自圓其說，而具啟發性的卻是絕少的。今次對低俗喜劇評論的反應，其實是挺 one-trackmind，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寫評論從來都要有一些信念、看法、勇氣去表達，而爭議性也既是作品和評論的生命力。通常最有爭議性的評論也是最有趣的。

主持：多謝沛理的分享！我也很簡單地說一下自己的感受吧。第一點是我一邊聽，一邊覺得分享非常動人，同時感到也很慚愧。因為作為一個香港的評論人，對於事情，我也沒有表態，還沒有公開的寫。我覺得自己到底是不是明哲保身呢？那是不是我的考慮呢？我也要再想一想。我還沒有公開寫的關鍵在於，我覺得當事人還沒有很清楚、很合乎比例的講出他們看法的時候，我沒有足夠的自信、

材料讓我思考理解這個事情。這事情吵鬧了一陣子後，其中一位當事人接受了一個訪談，經過媒體的轉載和刊登，當中有多少斷章取義，可能當事人的更深、更廣的想法沒有寫出來。而另一位當事人在挺後期時發表了一篇文章，也是藝發局的新聞公告。假如當事人都沒有用合乎比例的做法來說明、澄清、反駁、回應時，那是不是我們反思下。我去一些公開場合演講、上課和學生討論時，我也有說這事情怎樣從五個角度去分析。那為甚麼我還沒有公開把它變成白紙黑字呢？我曾經問過自己，當事人還沒有寫清楚，我心中有很多問號，我怎樣去評論呢？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如果這是一個權力遊戲，牽涉到朋友和敵人的話，內裏到底有甚麼互動呢？我個人覺得可能還需要思考。而第二點就是我從 1997 年回香港，也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也有過相似的感受，覺得自己有很多敵人，可是我沒想到原來自己有那麼少朋友。我記得 1997 年經過一個報紙的事件，有深刻的反省。有朋友說了一個蠻好的比喻，他說：香港的文化界、寫作界好像一個黑社會，裏面有三頭。你是大傻嗎？一個人走來走去。人家沒有三頭，幹甚麼要幫你？有一些不倫不類的比喻，但我對它們挺深刻的。我真的是個大傻嗎？那其他三頭跟我有甚麼關係呢？我朋友當時的比喻我思考了很多年，也放在心裏很久。可是，當時也有其他朋友給我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說：經過很多爭議，言論自由限制之後，你仍能站起來，沒有影響到。比方說，沒有人因這件事而丟了工作、失去了發言陣地、受到調查等等。假如我們期待言論自由的話，當然也包括扭曲、抹黑。我們很難天真地期待言論自由永遠是正面的，一定有一些黑暗的部份。問題是在社會中，黑暗部份出來以後，還能不能站着、會不會突然被保安打、會不會被革職、會不會和領導談話、會不會連表態也不敢、會不會要逃亡。我覺得這方面香港實在是太美妙了，我還能站得着。談這件事只能反映你的無知、偏見、陰暗。我在城市大學寫評論，不斷跟右派、左派談事情和觀點。有很多人去找我們的校長，在他面前說我壞話，要把我革除，但我仍站得着。我非常感謝曾慶江，因為有些部門可能很不一樣，馬家輝早就被踢走了。我覺得社會的美好便是在於這

裏。可能沛理會有一些回應，但為了不讓許知遠睡着了，我們先讓他說說。我們來歡迎許知遠！

許知遠：我剛才一直在掙扎理解香港的語境，那個廣東話的……但這挺困難的。

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他不一樣的精神，有些時代是一個小作家的時代，可能波瀾壯闊的時代，有些時代可能是詩人的時代，相信未來可能是非常激動。

有些時代可能是悲劇的時代，要寫出這種悲壯的東西，才是最動人，有力量的東西。

然後，在所有類型裏面，你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批評，是否生活在精神世界裏某種富翁，不能成為獨立的世界，你需要批評文學政治社會，有一種依附關係。所以……我忘了誰說的，他說「批評家生活在精神王國的最底層」，這沮喪的判斷。但是有些時代屬於批評家的時代，如果你生活在1960、1970年代的美國、歐洲，批評家是生活文化中心人物。

屬於批評家的時代往往是巨大的價值混亂，美學標準混亂，道德標準混亂的時候，由於這些混亂和速度的變化，我覺得可能暫時

批評是直接了當的方法，

某種疏理者的方式。混亂的交錯就是生態，我最喜歡讀的文學批評都是詩人寫的，詩歌批評。我自己都寫了批評散文，也有最動人的評論。我想剛才三位都講了，中國是巨大自我審查國家，而且現在中國跟我們想像的形態不一樣，就像1984的時候不一樣，大家都不敢發聲，而現在中



國，你看都是不停吵鬧，所有附和，表達時代憂慮。總有一天，我們所有人都是作家，沒有人作讀者，所有人都在講話，沒有人在聽，這種混亂是由於政治上的高壓，政治上的消費主義帶來。因為革命，無數人因為政治壓力不能清晰表達。同時我們有過多的表達工具，帶來了雙重的價值混亂，就帶來各種的喧鬧。但由於這種當很多人有一個表達舞台時，往往是一個時代出現各種方面的斷裂時代，但很多批評家他們就感覺到政治、美學、道德上，都會意識到帶來重大的斷層。因為文化是一代一代的研究，你需要研究拉丁文，需要研究民族心。但突然大批的暴發戶，他們擁有英國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他們非常吵雜。包括美國，美國的批評家覺得美國生活，現在中國這麼多無從的問題，包括中國與世界周圍的衝突，其他文化的衝突，關於香港、台灣的問題。

我想這樣的時代，批評家反而獲得一種意外的巨大舞台。所有文類的劃分，詩歌也好，小說也好，批評也好，都是一種劃分嘛。最終不管通了甚麼方式，目標都很像。而且如何挑出眼前問題，都是非常漫長的。其實如果談到批評的話，不止審查，整個華人文化是巨大的悲劇。我上次旅行去墨爾本，有華人生活在那裏，有華人報紙，沒有審查，但都是非常吵的，雖然沒有任何審查，但沒甚麼可說，沒有甚麼評論東西、評論能力。英國人剛來，很小的殖民地系統，他們辦了《南華早報》。我想整個分析能力，判斷整個環境的確實，是我們思維系統的缺失，是更大的困境。他們想去審觀，但又不敢去。台灣的媒體電視也好，辦了二十多年，也是一樣，一塌混亂。我想香港也一樣，大家基本有很多表達空間、自由，但是做乏評論能力。我想這是更大的內在悲劇。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怎樣去培養一個對世界的批評性思维能力。

如果讀報紙的話，包括我們對評論的了解，都是非常瑣碎的，非常個人的整理小情緒的一種表達，你是能夠創建自己跟世界的聯繫，是評論者需要評論世界的變化，看法不止個人感受，這來自世界上社會上文學上的認知的培養，所以這比較重要。所以，我想要回到理想時代是非常需要英雄式的時代。我覺得批評眼光，一面對

龐大的世界，包括所有問題，資本家與非資本家的問題，我覺得需要一個英雄式批評家的人，華人世界需要這樣的人，整個華人世界面對這樣的斷裂，所有人的紛爭，如何創造知識的整體性感覺，我覺得批評家需要這樣的時代。

主持：好，謝謝。我想許知遠一定需要這種英雄式評論家，來點出中國社會該往的美好地方，這些環境能不能讓批評有效的出來。但我畢竟是門外漢嘛，我看報刊雜誌，評論數量一點也不少，每個報紙每天都有評論，看滿版都是字，用媒體的字，叫「字海」，排山倒海。我覺得他們寫的角度思維都一樣，東坡肉的典故，完美的食譜，實在都一樣，太相似。許知遠的評論放在任何社會都是非常突出，假如中國有多一點像許知遠的評論，那中國會進步得很快。因為剛剛許先生說起個人的雜感，我寫了三十年散文，當中有一半都是個人雜感，我覺得自己寫得挺好，那裏面有個挺搞笑，個人雜感少一點的話才更好。如果你能寫得像許知遠一樣還好，不然就不要把雜感寫得太多，不要多加那些宏論。在我閱讀範圍，大多都是一樣，在你寫最後一百字，先抄了一大篇蘇東坡的典故，所謂雜感可能只是兩百字，可能想從東坡肉裏面找出中國前途的未來，跟歷史的源由等等，如果這部份可以少一點的話就好。中國人透過不同閱讀文字的小雜感，訓練我們心靈的敏感度，培養我們的美感能力，這樣我想中國會進步得更快。當然事情要一齊進行，我們需要一些評論，也需要小雜感，這就是美好的中國。

廖偉棠：我也想說兩句。我想評論英雄式的批評家的姿態，在香港受到一定程度的不一樣的發揮。因為我覺得那種是不合時宜的批評家，香港某些權威的批評家，他們原來都是不合時宜的英雄，講一些人們不愛聽的話，慢慢他發現那些不樂意聽的話出現一班死忠的粉絲，越來越多死忠的粉絲的時候，他就劃上一個英雄主義的取態，他必須要做一些話語的認領者，認為這個話語的絕對認領者的時候，他必須要說出更多令他的粉絲支持的話，這些話在時代浪

尖上邊能夠高瞻遠矚，令整個社會價值觀都起了變化。

我一直覺得香港的批評有其獨立性的優良傳統，香港的批評者相對沒有那個迫切要讚對的必要。在大陸要為自由主義或是新左派讚對，在台灣有時更令人失望的是必須要為藍、綠讚對。批評的獨立性不止是立場的獨立性，是那個文體本身的獨立性。

剛才許知遠提到批評是整個金字塔最底下的，的確是有這個感覺，詩歌老是被置於金字塔的塔尖上，詩歌是最貴族的。那本人就很分料，又寫塔尖上的東西也寫最底下的東西，並且以最底下的東西為生。我發現這兩種東西互補的地方是重要的，當詩歌被不強調其非功利性的時候，你是否要考慮詩歌置身於這麼功利的社會、時代中，它的功利性假如它是必不可少要發生的話怎麼樣以一個正面的方式發生。

然後，批評是最可能被利用的文體，它會被利用於宣傳；被利用於公知；被利用於反喻等等。在這個時候你在書寫文章，你的非功利性就特別顯得難能可貴，正在那裏邊那個平衡怎樣把持就看重你的功力，看出你超越掌握某事件某藝術的功力。

接着林沛理先生所說的大部份我都認同，只有一點我想補充，關於文本批評、文本細讀的確是過時。我贊同這個想法，但過時並不等於沒有其合法性，它已經不是一種流行的批評方式，所謂文本細讀是新批評派的事，已經是60、70年代流行過的東西，但是現在假如不能在一個批評裏完成摒棄一個文本的細讀呢？我本身是不能這樣做的，比方說，以低俗喜劇為例，低俗喜劇最近得到香港金像獎的最佳男、女配角，這事情令我比較生氣，帶來給我的反感遠大於之前各種爭執帶來的反感。在這個頒獎禮的過程中就不存在文本細讀，因為他沒有給出一個理由去細讀，例如鄭中基和陳靜的表演或者在電影架構裏擔當的角色怎樣令他配領這個獎，他怎樣比這年度其他男、女演員更值得獎，這就需要文本細讀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缺乏文本細讀，那標準就無從談起，那電影可能是捍衛香港本土電影最極度的一個例子，為了捍衛而作出選擇，不是說從電影而作出選擇，這個時候文本細讀就很重要。

最後，我也想補充一句，其實我也想寫藝評獎評論，但也有明哲保身的考慮。我不是一開始就看低俗喜劇，而是這件事發生後才去看這部電影，看完這部電影後，我覺得不值一提。好像大家說的沒有需要評論的地方，這部電影可以說是「得啖笑」，沒有甚麼好深挖的地方。倒過來看，賈小姐的文章的時候，她在沒有需要深挖的地方多挖了點，這才是令人失望的地方。其實鄭中基的角色放回香港電影傳統裏，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角色，他就是一種很無聊的搞笑的角色，他的大陸人身份並不是很重要，他反而更像一個香港暴發戶，但只是被扔在廣西的北海，把一個角色這樣極端化也是一種嘩眾取寵的方法，但這就認為是香港人或是香港電影製作人對中港矛盾的一種極端化，那它不比當年電影《表哥你好嘢》這些東西更有可談性。對於我來說，正因為是這種無聊和細碎的態度，令鄭中基這個角色失去了被討論的意義。

林沛理：

其實我剛才所說關於朋友和敵人的話，是無意讓馬家輝、廖偉棠、許知遠覺得需要回應等等。假如我在事情上沒得到更多聲援時，



是不關任何人的事。事情發生與否，總有其原因的。如果有任何人需要反省的話，第一個必然是我。在事件完結了接近兩個月後，這數星期以來，有很多評論人組織、大學等等找我去當研討會嘉賓或演講者，也是想討論關於香港文化評論的問題。印象最深刻的是收到一個電郵是說熱鬧過後現在便是冷靜的時候。對部份人而言，是抱着一個看熱鬧的心

態。可是，我真的覺得整件事情的當事人不只是我們這班評判或得獎者，而是關於香港社會的事，也牽涉到每一個香港人，是關於社會態度、社會價值。我不是想要誇大整件事的重要性。從很多角度去看，也只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如果說我是有點失望的話，站在讀者的角度而言，是沒有看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文本。寫文化評論很重要，要找到一個社會現象、作品，然後找一個最有效的角度去寫一篇文化評論。我們並不是做一篇調查式的新聞報道，所以不必知道很多資料。但我們要有能力於事情上看到最本質、最關鍵的事，把握到一個最有效的評論角度。我不是看到很多從事件上以最有趣的角度的文章。

主持：那為何你不寫關於該電影的評論呢？你既是文化文學評論家，同時寫不同的文章。你可以把這個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文化個案去寫。我們作為拜讀你大作、專欄、結集的忠實支持者，十分期待你可以用最棒的角度、第一手的資料、親身的感覺去寫。

林沛理：第一，我發了新聞稿，其實也交代了基本的事和觀點。第二，所謂的第一手資料，我覺得整件事有很多層面，有些層面是沒有所謂第一手資料。但如果你想知道一些關於內幕性的事，一些不為人知的事，那是不是有意思呢？我倒也不這樣認為。

主持：那可能是有期待吧。而且來日方長，我個人也還沒有寫。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有另外一種寫法。我現在先把時間交給現場朋友問問題，和嘉賓們交流吧。其他問題呢？

問：我想問許知遠先生。其實在內地，評論人在底線的不同方面是在哪呢？

許知遠：因為在所有的詞語放浪年代，都會有談話人物，都會有很自然事情，我覺得都自然的過程。大量同化、自然的過程。另



外就是原判之後真正出現的知識分子，他們提供精神意見，新的看法。現在中國面對的問題就是知識分子處於邊緣化，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反資主義，反資主義在中國發生，知識本身就不在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泡沫很快就過去。

主持：對於這個我有非常精闢的見解，但是我不在這裏講了，一講就會講很久了。

問：我有個問題關於評論本身，是為了自我表達，還是精神性的構築？

林沛理：選擇寫作當然是表達自己，寫評論是因為你對某些事稍有強烈意見表達，這是本能。用文字發表，是更進一步。表達自己是本能，如果只容許你看電影，不容許你評論，看電影樂趣就減了一半。評論的衝動是本能。發表評論中間有過程，已不是純粹表達自己，選擇用文字表達是想供人閱讀，想表達的意見引人共鳴，

希望能影響人，希望與人討論。這就要想供甚麼人閱讀，這方式能否影響人，達到與人溝通目的。現在我看評論都是只看第一段就可決定看不看下去，因這可見作者花了幾大氣力與人溝通。香港的評論都是讀者意識薄弱，因為作者急於表達。

許知遠：當然首先是自我表達，從自我出發。作為表達武器。所有寫作都是自我出發。最終是完全平衡關係，評論是常常失衡的。

廖偉棠：寫評論是一種雙手互駁的過程，你是在跟自己辯論，如果你是忠實於藝術的人或者是忠實於有標準的人的話，有可能到最後有機會把自己駁倒，你不要預設很強的立場，當預設一個立場的時候，你也必須有跟這個立場辯論的能力，可能最後你也把自己推翻，但你遵循了規則，不是那個先入為主的你，你是遵循了藝術的規則。

主持：現在大家用幾句話總結一下。因為下年還有沒有城市文學節也不知道。所以講幾句吧。

許知遠：回應家輝之前說的，我當然覺得個人感受最重要，人可以不斷深化思維情感，那可能是直截了當，也可能是綿長。每個人的思維情感都很多層次，一個層次很無聊。

廖偉棠：我做香港文學獎的評判，所有文學獎中只有這個獎才重視批評。藝術評論獎是很重要的，但在藝評獎的風波裏，我不同意有些人否決了這個獎的意義，我覺得這個獎對香港人很有意義的，藝術評論是對作品作出合理的批評，表達個人意見，而不是其他人說的浪費公帑。

林沛理：

我的忠告便是，假如你喜歡評論，看便好了，千萬不要寫。這

些吃力不討好的事，讓別人便做好了。如果你有欣賞評論的能力時，有很多好的評論讓你去挑選，用不着自己去寫。